



我所知道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朱佳木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朱佳木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FD28-2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朱佳木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

ISBN 7-5073-0537-6

I . 我… II . 朱… III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文件-学习参考资料 IV . D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097 号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 者/朱佳木

责任编辑/于丽娟

封面设计/李法明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

850 × 1168mm 32 开 15.5 印张 285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73-0537-6/K·218 定价：23.00 元



邓小平、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于 1982 年 8 月 14 日党的
十二大召开前夕在陈云家中谈话。(本书作者摄)



陈云与本书作者
合影(1982年)。



胡乔木与本书
作者合影(1977年)。

自序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在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汇集。我尝试为报刊写自己的文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不过，起初我几次改行，大多从事的是行政事务性工作，即使有文字工作，也是辅助性和公文性的，加之自己惰性作怪，所以写的少，发表的更少，只是偶而有一两篇。近三四年改为主要做研究性的工作，不时有学术研讨会要提交论文，又常有报刊来约稿，逼得自己要挤时间写，于是发表的渐渐多起来。但既便如此，也没料到累积至今，竟然已得近 30 篇，20 余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于对学人的关爱，把它们收集起来，出了这本小册子。因为正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故以其中《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题目作为书名，以示对这一伟大事件的纪念。

这近乎 30 篇文章，按照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文章的编排也根据内容为序。第一部分 4 篇，都是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的历史问题，有我的回忆，也有考证和研究心得，基本属于记述文，题为“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部分 11 篇，是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理论时事方面的问题，大多属于政论文，题为

“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第三部分8篇，是对陈云同志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有学术论文，也有评论性、介绍性的文章，题为“关于陈云研究”。第四部分4篇，是针对社会上某些现象所发的议论，属于杂文、随感一类，题为“杂感”。

对于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这许多文字，本来足可聊以自慰，何况不少还见之于《人民日报》、《求是》、《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权威报刊，其中很有几篇“大块文章”，似乎更可“踌躇满志”一番。然而，一旦被汇编成书，只有薄薄的一本，反倒颇感自惭形秽、诚惶诚恐起来。原以为出了书，总算“到了一站”，可以“休息休息”了，谁知竟给自己带来了“新的烦恼”，造成了要“继续赶路”的压力。不过，记得铁人王进喜说过：“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如果这本小册子的出版真的能压着我今后更加勤于笔耕，督促我将来能有更厚的集子付梓，倒也不失为额外的收获。但那是后话，要看自己的努力了。

书的厚薄固然一个问题，却毕竟是数量的问题，要紧的还在于书的质量，在于书中的内容是否言之有物。当然，这要由读者来评判。我要说明的只是，我虽然有幸在当今中国的几位思想大师、学问大师的身边工作过，可是由于理论和学识的基础都打得不牢，加之悟性不高，终于未成大器。如果读者看过这本小册子后，

尚能在一两个地方感到有所启发，有所收获，那也得益于这些大师对我的教诲。所以，我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他们，献给一切曾给过我教诲的前辈们，权当这是我对待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回报。同时，我也热切期待着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还能有所前进，有所提高，哪怕只是一点点。

1998年10月29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3)
一 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4)
(一) 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5)
(二) 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	(13)
(三) 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30)
(四) 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 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	(37)
二 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46)
(一) 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46)
(二) 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48)
(三) 关于会议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	(67)
三 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89)
(一) 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89)
(二) 关于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 讲话稿	(92)
(三) 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	

讲话稿	(97)
(四) 关于全会公报稿	(99)
(五) 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103)
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	
转移的决策	(111)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125)
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62)

第二部分 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努力掌握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的辩证法	(185)
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7)
对邓小平所有制理论的再学习	(219)
——兼谈对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问题 论述的全面理解	
大力倡导和认真学习周恩来作风	(241)
——纪念周总理诞辰 100 周年	
党的优良作风的光辉典范	(255)
——深切怀念陈云同志	
重温陈云关于新时期党风建设的论述	(271)
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思考	(285)
我们为什么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304)
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317)

只有讲政治才能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26)
对社会主义社会文艺作品商品属性问题的探讨 ······	(344)

第三部分 关于陈云研究

陈云研究的新进展 ······	(353)
学习陈云的决策比较法 ······	(364)
——读《陈云文选》第二卷	
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	(399)
陈云党建思想的集中体现 ······	(425)
——读《陈云论党的建设》	
陈云在长征路上的又一份珍贵文稿 ······	(445)
陈云的西柏坡之行 ······	(453)
一部歌颂陈云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光辉业绩的 影视作品 ······	(459)
——电视连续剧《四保临江》宣传画册序言	
谈谈电视连续剧《陈云在 1949》 ······	(463)

第四部分 杂 感

从“中国人非中庸”说起 ······	(473)
访日归来谈风气 ······	(476)
小议朱元璋严禁宦官后妃干政 ······	(481)
还谈《世界名画》 ······	(484)

第一部分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所知道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代中国研究所为了写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段历史，要我来讲讲当时的情况。我曾有幸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但只是作为胡乔木的秘书去的，了解情况和对问题的理解都很有限。不过，既然我经历了那段历史，特别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了一些别人不大知道的事，那么把这些情况讲出来，为大家写历史补充一点材料，提供一些背景，确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由于是侧重于讲我经历、我知道的情况，所以讲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大家听后批评指正。

下面，我分3个部分来介绍。

* 这是作者于1998年4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新时期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 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这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并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这样一个结果，这也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转折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突然的？是不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我认为，转折发生在 1978 年 11 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转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至于是在 1978 年 11 月还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一些时候发生，那是偶然的，但一定会在此前后发生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孤立地看，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突然的，但只要把它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和粉碎“四人帮”后至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段时间里群众的情绪、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它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顺理成章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内国际的大背景，大家搞

这方面研究，知道的比我多。这里我只想以三中全会取得的几个重要成果为线索，讲一点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建国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党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个认识直到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尽管中间发生过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在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的头脑中，始终没有出现过动摇。1962 年后，重点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对这一点，党内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表达就是了。1975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实质上就是要重新把经济建设做为党的工作重点。那时，我刚调到国务院政研室。政研室正根据邓小平几次讲话的精神，在胡乔木领导和邓力群具体主持下，起草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标准。这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发表，“四人帮”就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文章的事被揭发出来，连同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打成“三株大毒草”。“四人帮”硬说“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回到唯生产力论”，这完全是污蔑。但说它的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确实的。邓小平是这个思想，其他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也是这个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0天，即1976年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陈云，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王震、姚依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另一条是：“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可见，在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思想对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来说，是一贯的，没有疑问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也是重视抓生产的，这一点与“四人帮”不同。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还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要“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往往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例如，十一大报告提出的8项任务，第一项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进行到底”，第四项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实际工作中，当然会产生种种矛盾。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1978年10月3日下午，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由其他人为他准备的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邓小平在谈话中说道：

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